

马华新文学的先驱： 1915年至1919年9月 马华白话小说研究*

郭惠芬

一、前言

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和苗秀在提到马华新文学的发端或起点时，都以1919年10月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办为标志。^①另一研究者李志鉴于马来亚吉隆坡的《益群报》于1919年8月起发表了一系列白话小说，认为南洋白话新小说的起点应提前至1919年8月。^②

然而，这些文学史家或研究者都把马华新文学研究的视野专注于1919

郭惠芬 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本文据提呈中国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等举办的“第四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1999.12.3-6）论文修改而成。

①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新加坡：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页12；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页18。

② 李志：〈南洋白话新小说的先驱〉，《中教学报》，第24期（1998年12月），页116-117。

年。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杨松年副教授关注过新加坡的《新华侨》杂志和马来亚《槟城新报》在1919年之前出现过白话小说外，^③至今尚未有人对1919年9月之前的马华白话小说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马华新文学受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由马华文化界人士大力推动而自觉地走上新文学道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是否如有的文学史家所认为的那样，1919年之前的马华文学作品都属于旧文学的范畴，^④而没有新文学的先驱存在？如果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就会形成这样的认识：马华新文学是在1919年10月初，才从纯粹旧文学的基础上，一跃而开始新文学的起点。可是，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早在1915年，马华报章已有白话小说出现。此后直到1919年9月，马华白话小说有如一股漫流，缓慢然而却一直在马华文坛流动着。

为了澄清马华文学史这一重大问题，也为了填补马华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本文将着重研究马华报章《槟城新报》、《叻报》和《益群报》于1915年至1919年9月刊登的白话小说，并探讨这些白话小说的先驱作用，希望抛砖引玉，就教于专家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1919年之前的马华白话文学，除了白话小说外，并未见到以白话文创作的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文学作品。直到1919年，马华报章才出现少量的诗歌、散文等新文学作品。因此本文在探讨和研究1915年至1919年9月的马华白话小说时，为了集中研究，就不再涉及1919年的白话新诗和散文。

二、1915年至1919年9月马华白话小说的特色

1915年至1919年9月的马华白话小说，分别刊登在1915年至1919年9月的马华报章《槟城新报》的文艺版位，以及《叻报》和《益群报》的副刊上。在这些版位或副刊上，同时还刊登大量以文言文创作和著述的诗

^③ 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页201。

^④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新加坡：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页40。

歌、笔记杂谈或时事评论等。这些白话小说在当时以文言文为主的华文报章中十分醒目。笔者将尝试论析早期白话小说的特色，并探讨它们的先驱意义。（以下论及的白话小说出处均见文中所列之表，不再另行注明。）

(1) 前期以翻译小说为主，后期创作小说迅速增加

综观 1915 年至 1919 年 9 月的 39 篇马华白话小说（其中 6 篇被重复刊登），我们可以 1918 年为分界点，将这些白话小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的马华白话小说（1915 年至 1917 年）刊登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表日期	篇名	作者(译者)	刊登报章	备注
1915.6.25-7.2	情海之雄	瘦鹃	槟城新报	
1915.8.6-9	鱼腹指环	马二先生(译)	槟城新报	
1915.8.11-20	奇男邸	不详(译)	槟城新报	
1916.2.21-28	美人计	武林魏易(译)	槟城新报	
1916.2.29-3.9	文字遗产	武林魏易(译)	槟城新报	
1916.3.10-16	血花弹	弹指	槟城新报	
1916.3.20-24	律师复仇	武林魏易(译)	槟城新报	
1916.3.31-4.1	庸医鉴	任君	槟城新报	
1916.4.12-17	骚姑娘撞着大骗子	冲叔(译)	槟城新报	
1916.4.26-5.9	赔钱货	武林魏易(译)	槟城新报	
1916.5.19-20	落第塾师之第二希望	老彭	槟城新报	
1917.3.12-14	鬼胎	醉	槟城新报	
1917.7.9	童子殉国	不详(译)	叻报	
1917.7.13-17	飞行艇争婚	不详(译)	叻报	

从上表可知，前期的马华白话小说以翻译小说为主。在 14 篇小说中，除了《情海之雄》、《血花弹》、《庸医鉴》、《落第塾师之第二希望》和《鬼胎》这 5 篇创作小说外，其余 9 篇都是翻译小说，如荷兰的《鱼腹指环》，俄国的《奇男邸》，英国的《美人计》、《文字遗产》、《律师复仇》等。其中也有从外国电影改译成小说的，如法国电影故事《童子殉国》，国别不详的《飞行艇争婚》。此外，创作小说《血花弹》也是取材自引发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奥国太子非的南被刺事件。

翻译小说基本上可分为“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两大类。“言情小说”主要描写西洋男女的爱情故事，如《鱼腹指环》和《奇男郎》。这类爱情悲喜剧有的幽默有趣，有的缠绵悱恻，具有较高的趣味性。“社会小说”则着重揭露欧洲社会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如《文字遗产》就对伦敦上流社会的高官名媛极尽挖苦和嘲讽，成为外国版的“官场现形记”。这时期马华白话翻译小说侧重“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这两类题材，与中国清末民初盛行的通俗文学的潮流是相契合的。^⑤即以《槟城新报》于1915年刊登的白话小说《情海之雄》而言，也是当时活跃于上海报界的作者周瘦鹃的言情之作。只是作者在三角关系的恋情上再添加一道关怀民生疾苦的“人道主义”光环。

1918年之后，翻译小说已不再占据马华白话小说的主要地位。但此后马华作者并未间断对外国小说的翻译和介绍，如1919年之后的《益群报》、《新国民日报》、《叻报》等，就一再译介法国莫泊桑、俄国托尔斯泰、印度泰戈尔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这种从1919年之前就有的译介外国文学的传统，为马华新文学提供了有益的滋养和学习的范例。

从后期的马华白话小说（1918年至1919年9月）来看，创作小说成为这时期马华白话小说的主流，而翻译小说已成零星之作。这从下表可以看出：

发表日期	篇名	作者(译者)	刊登报章	备注
1918.3.12-16	乐昌镜	不武	叻报	
1918.7.1-2	打黄金表	伊兰	槟城新报	
1918.7.13-17	湖滨一瞬记	南强	槟城新报	
1918.11.11-12	医生	云夫(译)	叻报	亦见于 1919.2.20-25 槟城新报

^⑤ 李欧梵提及清末文学界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是两种流行的小说样式，并认为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达到极盛期，十分流行。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页236，242。

1918.12.20-28	发票	陈肇	槟城新报	
1919.1.13-15	酒后狂谈	瘦菊	槟城新报	
1919.3.1-7	绕个圈儿	筱梅	叻报	亦见于 1919.6.19-25 槟城新报
1919.3.11-12	发财票	云夫	叻报	亦见于 1919.5.2-25 槟城新报
1919.7.8	一段	络宝	益群报	
1919.8.15-16	一个兵的家	杨振声	益群报	
1919.8.18-20	洋债	郭弼藩	益群报	
1919.8.21-22	怪我不是	某君	益群报	
1919.8.23-26	春游	叶绍均	益群报	
1919.8.27	北京社会之一瞥	小记者	益群报	
1919.8.27	蛙鸣	厚禄	叻报	亦见于 1919.9.25 槟城新报
1919.8.30	什么不早婚呢?	余铁懋	益群报	
1919.9.1-2	大钟楼	甲午	益群报	
1919.9.3	以后不敢	六湖	益群报	
1919.9.4-18	断手	予	益群报	
1919.9.18-19	谁使为之	汪敬熙	槟城新报	亦见于 1919.8.28-29 益群报
1919.9.19-20	祖家货与唐山客	大钟	益群报	
1919.9.23	旧夫	寄	益群报	
1919.9.24	隔壁谈婚	冯	益群报	
1919.9.25-30	吾之婚史	活	益群报	
1919.9.26	狗	寄	槟城新报	亦见于 1919.9.22 益群报

按：《槟城新报》和《叻报》小说篇目系笔者自报章搜集而得。《益群报》的资料则本李志：〈南洋白话新小说的先驱〉，见《中教学报》，第24期（1998年12月），页118-119。

由上表看来,在25篇白话小说中,创作小说24篇,翻译小说仅有《医生》1篇。创作小说主要有《乐昌镜》、《打黄金表》、^⑥《湖滨一瞬记》、《发票》、《酒后狂谈》、《绕个圈儿》、《发财票》、《怪我不是》、《蛙鸣》、《什么不早婚呢?》、《旧夫》、《吾之婚史》、《狗》等。这些创作小说与上述翻译小说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主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精神,其中有的描写市民生活,揭示市民阶层扭曲的人性和精神世界,如《打黄金表》讽刺丈夫骗取妻子做针线活辛苦赚来的钱,买了一只金表去讨妓女的欢心;《绕个圈儿》反映夫妻之间不能以诚相待,而是“以金钱为喜怒”。有的反映革命志士致力于推翻旧有社会制度的故事,如《湖滨一瞬记》。有的宣传改造民族工业的思想,如《酒后狂谈》。有的描写华人到南洋谋生的坎坷遭遇,如《乐昌镜》。也有宣扬人道主义、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如《狗》、《旧夫》和《蛙鸣》等。

如果说翻译小说还只是以白话文为媒介,向人们展示一扇窥视欧洲社会人情世态的窗口,那么创作小说则是作者以白话文反映自己所贴近的现实生活。它使马华白话小说从远距离眺望大洋彼岸的另一世界,转而关注与自身近距离的现实空间。这种在早期就已具备的对现实人生的关切情怀,后来一直贯穿在马华新文学之中。

(2) 从庸俗落后的思想趣味转向追求五四时代新思想和新精神

1915年至1919年9月的马华白话小说,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庸俗落后的思想趣味转向追求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趋向。

《鬼胎》、《落第塾师之第二希望》、《庸医鉴》等就带有庸俗落后的趣味。《鬼胎》描述华家二房少奶奶临产,等了七天,用了一百零七帖催生药,却一直无法产子,于是众人议论纷纷,疑为“鬼胎”。《落第塾师之第二希望》虽然意在讽刺满清落第塾师面临日暮穷途之际,准备乘“光复”(指张勋复辟)时,冒充死人的“贡照”和“文凭”去参加县试和道试,以博取功名的丑态,但小说读来“酸气逼人”,充满腐朽委靡的气息。《庸医

^⑥ 1918年7月1日《檳城新报》,《打黄金表》“黄”误为“簧”,7月2日始改正。

鉴》也是描述一个在民国成立后，失去北洋候补知县美缺的“老先生”，眼看搜刮民脂民膏的美梦落空，就悬壶济世，冒充名医，结果误人性命，只好畏罪潜逃。这类小说虽然带有揭露和谴责的主旨，但思想性并不高。即使在翻译小说《骚姑娘撞着大骗子》中，作者对老姑娘安忒暗中单恋骗子莫林登而落得家中遭窃的嘲讽，远远超过对莫林登冒充新牧师而行骗偷窃的谴责。早期白话小说这种庸俗落后的思想趣味，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态度并不认真，只是抱着“娱人娱己”的游戏心态，以迎合读者的消遣趣味。

早期马华白话小说的这种缺陷，在1919年之后的白话新小说中也存在。方修在指出马华萌芽期（1919-1925年）小说的一般缺点时，其中就有“态度不严肃”，“喜欢小趣味”的批评语，^⑦这大概因为一部分作者并未将小说视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创作的缘故。

不过，在另一些白话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趣味与上述作者已大不相同，他们的关怀视野转向国家、社会和人生。他们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工业思想、等级制度和陈旧的思想意识提出挑战，希望加以改造。如《湖滨一瞬记》描写汤家老老的孙子为了“革命”（应指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笔者注）而家破人亡的故事。作者虽然只是采用侧面描写，主人公始终未正式登场，但一个为了国家民族而牺牲“小我”的革命者形象，却给人留下慷慨悲歌的深刻印象。又如在《酒后狂谈》里，一位工人和商人看到东洋婆在推销日本杂货，认为中国的资本家应该出资开办工艺学堂，培植人才，改进工业，仿造洋货，使国货精益求精，才不会使国家“利权外溢”。这篇小说写的是本地题材，但发表的却是关于中国工业改造问题的见解。这类小说已具有前述带着庸俗落后思想趣味的小说所缺乏的思想意识高度。

随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早期马华白话小说的作者也由对社会变革和工业改革的关注，发展到对人性自身的关怀。人道主义、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等自由民主思想，也在《狗》、《旧夫》、《蛙鸣》等小说中出

^⑦ 方修：〈萌芽期小说的一般缺点〉，《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0），页22。

现。《狗》揭露“人不如狗”的不平等待遇，提倡人道主义精神。《旧夫》意在宣扬妇女解放的思想。《什么不早婚呢?》则是抨击当时南洋华人社会由父母包办的早婚（童婚）现象。其中《蛙鸣》以象征的手法，着力表现作者追求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反抗精神，尤其具有五四时期的精神风貌。而这些小说在《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创刊之前就出现在马华文坛，其先驱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小说对科学民主思想的宣扬，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已非《鬼胎》、《落第塾师之第二希望》、《庸医鉴》和《骚姑娘撞着大骗子》这类带着庸俗落后趣味的小说可比拟，它显示了早期马华白话小说进步的痕迹。而1919年之后，尤其是战前的马华新文学常常流露的侨民意识，以及对国家社会的殷切关怀，在早期的马华白话小说里，也可以找到来源。

(3) 简陋与精巧并呈的形式和技巧

从白话翻译小说来看，它们大多具有完整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言情小说中恋人之间感情的一波三折，或是社会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都有曲折的情节和戏剧性的结局。而且小说都较注意情节的铺垫与悬念的制造。如《文字遗产》首先从已故大臣哈福德的遗嘱在报上刊登开始，然后围绕这份遗嘱，展现与哈福德生前关系密切的高官名媛对其继承人约翰前倨后恭的不同嘴脸，最后才揭示哈福德立下这份遗嘱的用意和效果。这种对故事情节的经营和对戏剧性的追求，自然较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使小说有着完整的艺术形式和较高的创作技巧。

从创作小说来看，这类作品的水准参差不齐，差别较大。有的采用简单的对话体形式，缺乏故事情节的经营与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充其量只是以人物的简短对话作为某种思想或概念的传声筒罢了。如《狗》和《旧夫》，都只用二、三百字的对话，分别宣扬“人道主义”和“妇女解放”，实在简单粗劣得很。然而，有的小说却能突破短小篇幅和形式的限制，而给人深刻印象和回味，如《蛙鸣》就是一篇难得的“微型小说”。

此外，有的小说带着旧小说的一些特点，如在结尾处，作者忍不住要跳出来议论一番，破坏了小说叙事角度的统一性。《打黄金表》、《绕个圈

儿》、《狗》都有这种毛病。如《狗》在结尾处特别另起一段话：“记者曰。这篇小说。要请讲人道主义的人看看。现在的世界还是个什么世界。”

当然，上述创作小说的这些缺陷与不足，对于先驱性的马华白话小说来讲自然是无法苛求，也不应苛求的。即使是1919年之后的白话新小说，许多也存在“篇幅短小，叙述简略”^⑧的缺点。

不过，有的创作小说在故事的铺排，情节的曲折，结构的完整方面，以当时水准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如《乐昌镜》叙述某乙原在闽南某郡，因家乡水灾，一家人无法度日，只好做契约劳工到南洋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等地谋生。五年限满后，却迷恋上番妇，散尽辛苦赚来的千余金，最后只得流落到新加坡。而家乡的妻子因他音讯杳然，遂与某甲私奔到新加坡。不料某甲做工的米厂少东，因觊觎某乙之妻的美色，将某甲暗中推入海水中溺死。后来某乙夫妇在海边重逢。米厂少东深感罪疚，就赠送千金让他们夫妇回国。小说以《乐昌镜》为题，应是借取汉朝乐昌公主与丈夫“破镜重圆”的寓意。这篇小说发表于1918年3月，连载五期，约四千五百字。以马华萌芽期小说“多数在千字左右至二千之间”^⑨相比，在马华新文学正式发端的前一年，马华作者能够创作出这样情节曲折、结构完整的白话小说，不能不令人瞩目。后来另一作者李西浪于1925年创作中篇小说《蛮花残果》，^⑩与《乐昌镜》的故事情节有些相似之处。虽然李西浪不一定读过《乐昌镜》，但以白话文反映华人前来南洋谋生的坎坷遭遇，《乐昌镜》是具有先驱意义的。

此外，有的创作小说在景物描写和气氛渲染上，也有其精彩之处。《湖滨一瞬记》在开头、中间和结尾三处都着意描写湖滨的景物，以渲染一种悲伤凄凉的气氛。小说开头描写湖滨的黄昏秋色，如寂寞的杨柳、湖中的残荷、西山的斜阳等等，为汤家老老的悲剧故事进行渲染，而汤家老老

⑧ 同注⑦，页20。

⑨ 同注⑦，页21。

⑩ 李西浪：《蛮花残果》，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5年1月31日至9月4日。

就在这萧瑟的秋色里，开始向上天控诉老天对她全家的不公，以及向邻居妇人倾诉家破人亡的哀伤。这时，天地万物仿佛也感染了她的哀情：“湖光明灭不定。红霞才剩一抹。……湖面有无数飞鸿。哀鸣不已。绿烟栖在水面……只觉得腾漫漫的翳了眼睛。……暮虫唧唧。歌不像歌。哭不像哭。听去却夹了无限的伤心。……风声一起。草木也作不平鸣……”最后，当汤家老老在邻妇的劝说下离开湖滨回家时，作者又着意以湖滨景色的描写作结，使读者沉浸在小说创造的悲情氛围中。这篇小说的景物描写和气氛渲染，与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达到如此相契合的程度，也是早期马华白话小说难得的收获，它向读者展示了个别创作小说精巧成熟的一面。

(4) 文言与白话参杂的语言

早期马华白话小说的语言并非纯粹的现代白话，而是参杂着文言语汇的白话。我们可以在许多篇章里看到文言与白话互相参杂的痕迹。如在人物称呼方面，第一人称有“吾”、“余”、“在下”、“妾”等，第二人称有“汝”、“尔”、“君”等旧式称呼。在行文里头也常夹杂着文言语汇，如《乐昌镜》中：“在下正默默出神。发生无限感触。忽背后有人哗道。老枢。尔胡思乱想做甚么。莫不近日又受外界刺激。自独一个坐这里忧国忧民吗。”其中有些是文言色彩很浓的字词。有的小说在开头或结尾均用文言语句，如《绕个圈儿》：“筱梅曰。夫妇道丧。乃亦以金钱为喜怒。而不能相见以诚耶。嗟夫。”这种文言作结的形式，颇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而且，当时的白话小说文句之间基本上只有简单的断句符号，尚未使用后来正规的标点符号，这从本篇中的一些引文可以看出。

不过，有的小说语言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文言的影响，但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如上文引述的《湖滨一瞬记》，其状景抒情的语句就颇有韵味和感染力。再如《乐昌镜》的语言，虽然还带有文言色彩，但基本上也还明白流畅，其中如描写新加坡热带晨景的语句，就比较生动：“有一天是四月的时候、晓钟初动、太阳还未出现在那地平线上、天气已是异常炎热、在下所住的小旅馆、屋狭人密、万分郁逼、盂面漱口后，急跑到附近海边一座公园、拣了一个座位、凉风习来、身轻如叶、耳听的是宿鸟呢呢喃喃、叫

个不休、目见的是东方碧云、与那蓝色海水相辉映、享受这个天然妙境、委实是身居热带中、有一无二的幸福。……”

从总体来看，翻译小说的语言比较明白流畅，白话文程度较高。然而在有的翻译小说中，作者特意以文言文翻译其中的书信段落，如《童子殉国》和《奇男邸》。从小说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进化的角度看，这固然不足为取，但如果站在当时文言文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文化背景来看，在白话小说中插入文言书信段落，却使小说增添一种独特的典雅韵味。如《奇男邸》中，尼罗在婚嫁之夜，发现丈夫栗恪特的父亲与自己有杀父之仇。在家仇与爱情不能两全之际，尼罗只得投水自尽。其文言遗书传达出哀怨缠绵的情感：“妾兹计已熟。事断无可两全者。故决于一掷。一两日间圣彼得堡河流中当有一株薄命桃花。随涛上下，即妾之谓矣。亦勿为妾悲。但愿心如金石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彼天上自由神方以手相招迎我辈于爱河浩荡中也。汝之挚爱妻尼罗留。”这种韵味十足的文言书信，当时的读者是会欣赏的。

不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挺进，最终达至纯正的白话文，毕竟是中国文学语言进化的总趋势，也是衡量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一个重要尺度。《益群报》刊登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杨振声的小说《一个兵的家》，就带有为马华白话小说语言起示范作用的用意。^⑩马华白话小说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以纯正的白话文进行创作，但仍为马华文学铺展了一条通往白话新文学的道路。其实，即使是当时的中国文坛，或早期的马华新文学，也未能完全达到使用纯正白话文的境地。方修就曾批评1919年至1925年的马华新文学的语言“半文不白”，^⑪显见新文学语言的纯正化，并非短期内可一蹴而就。

三、结语

上述的马华白话小说，分别刊登在1915年至1919年9月的马华报

^⑩ 活：〈新小说会〉，见《益群报》，第7版，1919年8月16日。

^⑪ 同注⑦，页20。

章《檳城新报》、《叻报》和《益群报》上。虽然各报的编者在1919年5月之前并没有任何关于刊登这些白话小说的说明,^⑬可以确定的是,编者绝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有意识地向读者昭示一种与传统文言文作品绝然不同的文学模式。在刊登白话小说初期,编者先刊登一些翻译小说,这些小说除了向新马读者开启一扇了解西方人情世态的窗口,而且也 and 清末民初盛行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有着契合之处,因此不至于受到当时习惯于欣赏文言小说的读者的排斥和非难。再者,这些翻译小说的文笔大都十分流畅,肯定不是出自普通译者之手,因此,这些带着异域色彩的白话小说也向新马作者提供了一种值得仿效的小说模式。其实,在鲁迅于1918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前,胡适、刘半农等人也致力于外国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的译介工作。^⑭

接着,从1918年开始,编者注重刊登以创作为主的白话小说。而且1919年各报还出现重复刊登一些白话小说的情况。这固然显示白话小说数量不多的一面,但同时也说明当时报章编辑对白话小说的重视。如上文所分析,这些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的创作技巧相比,总体上逊色了许多,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与缺陷(这些缺陷直到二十年代初期的马华新小说也仍明显存在),但他们却开辟了一条通向新文学的道路,并且成为马华新文学的先驱。虽然这时期马华报章编辑并未正式揭橥刊登白话小说的目的和意义,但他们刊登白话小说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意义是无须质疑的。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新马文化界深受刺激,《益群报》的编者正式提倡“南洋的文学界革命”。^⑮并于8月16日特辟“新小说会”栏位,倡导“写实派”及

^⑬ 《益群报》编辑至1919年5月12日方表示赞成北京大学的新文学先驱们“提倡文字革命”,“要将文学改作白话文”的主意,并决定“做起南洋文学界的革命”。见冷笑:《编辑剩话》,《益群报》,第7版,1919年5月12日。

^⑭ 胡适、刘半农曾在1916年至1917年的《新青年》杂志发表外国文艺作品的译作。参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第三卷第一号(1917年3月1日),第三卷第四号(1917年6月1日)。

^⑮ 同注^⑬。

“白话体”的小说。^⑩该栏位编辑“活”也身体力行，创作白话小说《吾之婚史》在报上连载。接着，10月1日创刊的《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也积极宣传新思想和推动新文学创作，使原先处于漫流状态的新文学先驱，开始被汇入马华新文学的时代洪流。因此，马华新文学并非是在纯粹旧文学的基础上一跃而开始新文学的起点，而是与此前的白话小说有着血缘的联系。当我们今日从沉睡已久的旧报章中，将这些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白话小说挖掘出来时，我们应该还原马华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并重视这些白话小说所发挥的先驱作用。

^⑩ 同注^⑪。